

“红星”闪耀长征路

■邱继臣

军史回眸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一颗“红星”在征途中闪闪发光；它传递真理光芒、激励斗争勇气、传播胜利捷报、颂扬英雄壮举；它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它就是《红星》报。

《红星》报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长征时期，《红星》报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出版发行的唯一报纸，是最早正面报道长征的报纸媒体。

1933年夏，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举荐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星》报主编。早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邓小平就曾协助周恩来编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生活动泼、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政治、思想、军事、文化等方面，对红军建设进行宣传，有力配合了苏区党、政和红军的工作，深受广大官兵的喜爱，被称为“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战士的良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随第二野战纵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路上，《红星》报编辑部的所有家当就是用扁担挑着的4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1台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2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编辑们在行军途中构思文章，一到宿营地，就把铁皮箱子当成办公桌，然后马不停蹄开始写稿、编稿、刻写蜡版、油印报纸……

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发行了进入长征后的第1期。报头“红星”二字，是邓小平的手笔。头版刊登的文章是《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文章简明地指出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红军必须突破

大山里的隐蔽战线

■白玉婕 王 宁

记 史

平西情报联络站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妙峰山上，是当年北平（今北京）西部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情报联络站。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平西情报联络站承担了情报转交、物资转运、人员转移等重要工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党中央对已经沦陷的城市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情报工作方针。妙峰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具有极佳的隐蔽性。这里寺庙香客不断，贩运果品的农民往来频繁，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条件。从妙峰山出发，经北安河、温泉镇、西北旺、海淀镇，可直入北平城，且距离较近。鉴于这些原因，平西情报联络站成为北平地区的重要情报枢纽。

1947年9月，平西情报联络站第三任站长梁波与北平地下交通员完成接头任务后，在鹫峰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危急时刻，他烧毁机密文件，被俘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1947年10月，平西情报联络站通过华北的地下党员获得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机密情报，随即马不停蹄地交给了晋察冀社会部。情报内容显示，驻守在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16日率该军主力赴保北战场，企图南北夹击晋北晋察冀野战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收到这一情报后，及时转发给野战军司令部，让野司领导人立即相机处置。晋察冀野战军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于10月向敌发起了清风店战役。在战役过程中，平西情报联络站又相继向晋察冀野战军前线发送了一些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为我在战役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扭转华北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役结束后，聂荣臻表示：“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如今，硝烟已经散去，只留下由平西情报联络站旧址改建而成的纪念馆，向我们诉说着那些隐蔽战线工作者用智慧与胆魄谱写的战斗篇章。



《红星》报1935年第18期。



资料图片

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铿锵有力的话语，给红军官兵和人民群众极大鼓舞。

长征初期，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屡屡受挫。为提振士气，《红星》报接连发表了《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等社论，阐明红军转移突围的行军作战意图，号召“每个红色战士在革命转变的紧急关头，都要坚信党的力量，坚信自己的力量”，要坚决同目前对红军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没办法、悲观失望的现象作斗争。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先后发表《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等社论和文章共10多篇，准确传达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使红军官兵更好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红星》报像是一盏明灯，照在战壕里，照在行军途中，照在每一个红军官兵的心里。

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在第3

版刊发文章《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同期刊发消息《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全面记载红军强渡乌江的英勇战斗经过，对强渡乌江的战斗英雄罗有保、王海云等22名官兵登报表彰。时任红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评价这篇文章：“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他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再次攻占遵义城。几天后，《红星》报用大量篇幅对此次战斗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共刊发消息2篇、社论1篇、通讯1篇、特写5篇。抢占大渡河，是长征中的关键一战，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战斗。战后，《红星》报用整版报道了此次战斗的经过，刊发了《我们已经胜利的（地）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头团的英勇战绩》一文，从“十七个抢渡的英雄”“空前纪录的急行军”“一个意志只要泸定桥”“一路打到泸定桥”4个角度报道红1团、红3团、红4团、红5团

长征中的两位朝鲜籍革命者

■李 奔 王正帅

军史撷珍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队伍里，有两名朝鲜籍的将领。他们同一时期来到中国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追随共产主义信仰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用热血与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写下了不朽的国际主义篇章。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独家档案。它是1939年第18集团军政治部登记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主人公是35岁的炮兵团团长武亭，籍贯一栏清晰写着“朝鲜”。

履历表上记载，这名朝鲜籍团长“从1930年起在红军中参加过多次战斗，任过连营长、团长、政治参谋、作战科长、炮兵主任、炮兵团长”。武亭原名金武亭，生于朝鲜。1923年，为寻求民族独立解放，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系统学习了炮兵专业技能。1925年，武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军早期稀缺的科班出身的炮兵专业人士。

1930年，红3军团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缴获了4门七五野炮。彭德怀曾在书中回忆：“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1931年6月，武亭出任中革军委炮兵营营长，为红军炮兵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武亭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黎平会议后调任红3军团炮兵营营长。

1935年懋功会师之后，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暗藏分裂野心，下令收缴各军团电台密码本，意图切断各路红军电讯联络，把控全军。危急关头，为保障党中央北上行动安全，彭德怀指示红3军紧急另编密码本，并设法与红1军恢复联络。彭德怀将此

重任交付武亭。武亭随身携带指北针、密码本和电台，寻找红1军的行军踪迹，冒险北上。武亭将密码本送达红1军当天，张国焘密电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率红3军和军委纵队前往俄界，与红1军会合。武亭这次冒险行动，为保障中央红军顺利北上作出了贡献。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武亭调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根据中央军委组建炮兵的部署，八路军总部交由武亭筹建总部炮兵团。1938年初，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成立，武亭任炮兵团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等职。1952年，武亭病逝于平壤。

一名走上长征路的朝鲜籍革命者，叫毕士悌。毕士悌曾用名杨林、金勋，1898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他因参加朝鲜爱国运动遭日寇通缉，逃往中国，先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学习。

1934年1月，毕士悌作为红军少有的外籍高级将领，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毕士悌任干部团参谋长。

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他协助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指挥干部团英勇奋战。二占遵义中，毕士悌和干部团一日行军100多里，配合主力作战。在巧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中，毕士悌和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夺取通安河，确保了红军主力顺利渡江。

红军抵达陕北后，毕士悌调任红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

强渡大渡河的经过。一系列浓墨重彩的战斗宣传，鼓舞了部队及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

心系红军建设，关心红军冷暖，是《红星》报的一大亮点。《红星》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刊发社论、评论和文章的形式，有的放矢地给部队提建议，为红军官兵服务。比如，长征初期，由于离开苏区时较为匆忙，一些红军战士缺少草鞋，不得不赤脚行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军速度和战斗力。《红星》报刊发文章《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呼吁各级领导都要重视战士行军穿鞋问题，并发动官兵打草鞋。四渡赤水后，红军主力直逼贵阳。当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派飞机对红军活动地区实行侦察和轰炸。当时红军官兵普遍缺乏防空知识和经验。1935年4月5日，《红星》报在《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一文中介绍了防空方法，并呼吁各级加强防空工作宣传。

《红星》报也是连接军民关系的桥梁。每到一个个少数民族地区，《红星》报编辑部就会把党的民族政策印成传单和报纸一起发出去，告诉少数民族群众红军是各民族穷人的队伍，主张民族平等，不欺负老百姓。红军进入湖南及云贵川边后，针对这些地区穷苦落后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红星》报大力宣传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求红军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损害群众利益。

1935年8月，红军进入自然环境恶劣、行军情况凶险的草地，《红星》报被迫停刊。在长征途中，《红星》报先后出版28期。那字里行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就像播种机，把红色种子播撒在红军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红军闪闪，照亮征程。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红星》报，纸页已经泛黄。但报纸上那颗红星，将伴随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继续闪耀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役。毕士悌亲自率领第75师223团为先头部队，乘夜暗开始渡河。中革军委指示：“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切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敌人发觉，立即改为强渡。”按照这一指示，毕士悌化装成农民，亲往岸边侦察地形，计算往返时间，选择登船和攻击地点及前进道路。渡河途中，部队被敌军发现，密集炮火迎面袭来，毕士悌当即下令变偷渡为强渡，一面组织队员火力反击，一面号召官兵奋力划船冲锋。由于指挥得力、官兵勇猛，登岸后红军很快突破敌人防线。

冲锋途中，一颗子弹击中毕士悌的腹部，毕士悌重伤倒地。官兵围上来抢救，他不顾自己的伤势，催促战友继续追击，歼灭敌人。陷入昏迷前，他仍不停询问，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有没有渡过黄河？

由于伤势过重，毕士悌壮烈牺牲。如今，在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紧邻着1936年红军东征强渡黄河的登陆点，人们修建了毕士悌烈士纪念馆，常常有人来祭奠这位把热血洒在中国大地上的朝鲜籍英雄。

不分国界的共产主义理想，凝聚起跨越山海的赤诚与担当。这份国际主义精神，镌刻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扫码了解长征途中的外籍革命者

红色足迹

松毛岭，如卧在闽西群山中的一条沉默的苍龙。它横亘南北80余里，松树满山，密密匝匝的针叶将峰岭裹得严严实实——松毛岭之名，便由此而来。

松毛岭南北纵贯，当年是中央苏区东部唯一的天然屏障。敌军若要跨过苏区的东部防线，松毛岭是必经之路，因此它被叫作中央苏区的东大门。这道门一旦洞开，红军无险可守，国民党军将长驱直入汀州城，直逼中央苏区的心脏。

我站在山脚下，抬头望去。山还是那座山，可90多年前的风，好像还在隘口里呼啸。登临岭上，中央苏区松毛岭战役纪念碑立在苍茫山色之间。纪念碑高19.34米，代表松毛岭战役发生的年份。碑身侧面，2个烫金大字赫然在目：军魂。就在这里，闽西儿女用血肉之躯抵住了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为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那场红军长征前的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防御战役，要从松毛岭脚下的中复村说起。

1934年秋，国民党“围剿”大军主力压境而来。为了守住东部防线，红军在中复村的红军桥上紧急扩红。廊柱上有一道浅浅的刻痕，那是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红军的最低身高线。为了当上红军，孩子们偷偷踮起脚尖，往鞋底塞进稻草，伸长脖子，只为能让头顶够到那道刻痕。这些在花名册上按下手印的孩子，大多都走进了松毛岭的硝烟。

我伸手摸了摸那道刻痕。如今木头被摸得光滑发亮，回廊梁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依旧清晰可见。廊桥外，阳光正好，村子里安安静静，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我不禁在想：90多年前那些争相加入红军的孩子们，如果知道此去就是永别，他们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前往？

当时，村子里有一名叫罗云然的老人，先后将自己的6个儿子送到这座桥，加入红军。当时区主席劝他留一个儿子养老送终，被他坚决拒绝：“没有红军分的田，这几个娃早就饿死了，就算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干革命。”老人就在村口的老樟树下，目送儿子们一点点远去。最终，6个儿子，没有一个活着回来。那棵老樟树，如今枝繁叶茂，投下一大片荫凉。90多年前，它遮住的是一位父亲望向路尽头的目光。

我走进中复村，挨家挨户地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很多老房子的门板左右都是不对称的，合不拢，关不严。听当地村民说，当时山上缺掩体，百姓便卸下自家的门板，扛上山给红军做掩护之用。战斗结束后，门板拆下来混在了一起，也分不清哪一块是自家的了。那场战役，中复村“户户无门板，家家无闲人”。

儿童团的孩子们也没闲着。那些10来岁的孩子，挎着竹篮，爬过一道道山梁，把水和红薯饭送到战壕边。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猫着腰，子弹从头顶嗖嗖飞过。有个老阿婆后来回忆，她当年天天跟着大人往松毛岭上送饭送水。那些红军官兵接过去，摸摸他们的头，笑一笑，又转身冲进了硝烟里。

7天7夜的鏖战之后，松毛岭静了下来。

当地村民说，战斗结束半个多月，松毛岭上空的血腥气依然不减。《长汀县志》用了短短一句话记录了这一仗——“是役双方死亡达数，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战事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曾留下一个800多人的加强营，收验火化国民党军尸体。红军烈士的遗体却只能暴露于山野。乡亲们心急如焚，山上躺着的，是他们的儿子，是她们们的丈夫，是他们的兄弟。可仗刚打完那阵子，国民党军控制得紧，哪条小路能走，哪个山头有人盯着，村里人心里都有数：上山，就是把自己的命往枪口上送。但这颗心，

松毛岭上红旗飘

■吴迪

终究搁不下。一天夜里，松毛岭脚下的文坊村，悄悄聚起了19个人。

19个人，凑在一间黑屋子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灯芯短得可怜，火光一跳一跳的。有人说：“要不算了吧，家里还有娃。”也有人把拳头攥得发白：“算了？山上那些人，谁给他们合眼？”没有口号、没有文书，最后就只有一句话，低得像一声叹息：我们自己来。

他们给这事取了个名，叫“无祀会”——无祀，是倒装句，即为祀无，意思是埋葬、收殓、祭祀在异乡去世、不知其姓名并找不到亲属的逝者遗体、遗骸。

第一趟上山，大家的脚步轻轻的。山里松林密，针叶落得厚，混合着泥土、火药和鲜血。走着走着，有人停住，指着一处草从，喉咙发紧：“在那。”荒草里，有一具遗体，蜷缩着，背上还背着一个破旧的竹筒。有人伸手轻轻扶正那身子，解下竹筒，里面还有半筒没喝完的水。他的手颤了颤，把竹筒塞回那冰凉怀里。

一个老汉蹲下去，用手一点点扒开泥土。他摸到一截断肢，小心翼翼地捧起来。有妇人背着娃上了山。她看见两具遗骸紧紧挨在一起，一具的手还搭在另一具的肩头上——到死都没有松开。她的眼泪簌簌落下来。

他们不敢停留太久，只好就地简埋，能埋多少埋多少。没有棺木，就用竹席布料裹一裹；没有名字，就记住方位，记住这棵树、那堆土。

就这样，他们一点点把遗骸就地安葬。后来，为了防止红军烈士遗骸被野兽畜畜破坏，他们又发动村民将烈士遗骸装进陶瓮和大水缸中，重新掩埋。

2010年，当地举行隆重仪式，把埋在甲利堂、斧头乾两处约3000具红军无名烈士遗骨，重新安葬到松毛岭上的红军无名烈士墓中，以告慰红军英灵。

从中央苏区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前转身，便能看见红军无名烈士墓。墓碑不高，静静地立在松荫里。碑上刻着14个字：青山处处理忠骨，红军精神代代传。

松涛阵阵，松风入耳。站在松毛岭上，我的耳畔仿佛传来那首当地人耳熟能详的山歌：“松毛岭上红旗飘，红军战士逞英豪。岭下人民齐支持，军民合作阵地平。”

下图：中央苏区松毛岭战役纪念碑。

王永欣摄

